

我国城市化效率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基于2003~2013年的数据分析

李俊奇,张红伟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成都 610065)

摘要:我国的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也存在着大量的问题。为了实现城市化的高质量发展与经济的较快增长,有必要对城市化效率进行研究,从城市化效率角度找出提高城市化发展质量与经济增长速度的路径。使用DEA模型对我国2003~2013年城市化效率进行了评价,并做了基于Malmquist指数的变动分析,提出了使用联立方程模型分析经济增长与城市化效率之间的互动关系,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应对策。

关键词:城市化;效率;变动;经济增长;互动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5.12.15

中图分类号:F29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5)12-0067-05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Urbanization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Growth

—— Evidence from 2003 to 2013

LI Jun-qi, ZHANG Hong-wei

(School of Economic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Abstract: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but there are a lot of problems. In order to achiev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rapid economic growth,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efficiency of urbanization to find out path of improving quality of urbanization and speed of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angle of urbanization efficiency. By the use of DEA model,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efficiency of urbanization from 2003 to 2013. On this basis, the change analysis based on Malmquist index are made.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urbanization efficiency is analyzed by using a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Finally, the conclus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are drawn.

Key words: urbanization; efficiency; change; economic growth; interaction

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带来了社会和经济的大发展,同时也开启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我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上升至2013年的53.73%,我国实现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城乡流动。城市化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带来了社会经济面貌的大为改善,但在巨大成效面前,我们不得不面对环境污染、资源低效使用、经济增长动力源不足且增速放缓、城乡发展二元化依然存在等问题。总体来看我国城市化发展的质量不高,如何实现城市化的高质量发展成为摆在我们眼前的现实问题。同时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的关系也值得关注。因此,对城市化的效率进行评价,研究城市化效率的影响因素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城市化效率角度探讨提高城市化发展质量与经济增长速度的路径就有了极强的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

城市化也被称为城镇化^①。效率前沿法是国内城市化效率评价中的一种较为常用的方法,该方法分为参数前沿法和非参数前沿法,其中应用最多的方法为非参数前沿法中的DEA模型。如:王家庭和赵亮^[1]、肖文和王平(2011)、李红锦和李胜会(2012)、翟爱梅和景显恩(2014)、吴旭晓(2012)、汤洁和王博(2014)、张荣天和焦华富(2015)等使用DEA模型从不同角度对城市化效率进行了评价并得出了相应的对策。上述研究成果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缺少不同地区间城市化效率差异的趋势性分析,城市化效率差异不利于地区均衡发展,因此有必要对差异的变化趋势做出判断;二是结论多样化甚至相互矛盾,投入产出指标选择的多样性导致了研究结论的多样化,甚至出现研究范围一致情况下相互矛盾的结论。

收稿日期:2015-03-23

基金项目:2014年四川省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SC14ZD02)

作者简介:李俊奇(1983-),男,河北邢台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金融宏观调控、金融工程;张红伟(1963-),女,四川巴中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金融理论与实践、宏观经济分析。

^①本文将两个概念视作同一概念。

关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现有研究成果中,朱孔来、李静静和乐菲菲(2011),张志勇和李连庆(2012),李金昌和程开明(2006)等学者使用VAR模型分析了两者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及程度;施建刚和王哲(2011),康继军、吴鹏和傅蕴英(2015)等学者使用联立方程模型,引入教育、产业结构、人口增长率、市场化进程等变量研究了两者的互动关系。上述研究成果缺少基于效率视角的分析,在日益强调资源高效使用的今天存在一定局限性。

2 我国城市化效率评价

2.1 DEA模型

DEA模型即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是由A Charnes和W W Cooper等人于1978年创建,是数学、运筹学、管理科学和数理经济学的交叉领域^[1],包括一系列子模型。其中的DEA-BC²模型由Banker、Charnes和Cooper于1984年^[3]提出,该模型中的技术效率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之积^①。本文以城市化的技术效率表示城市化效率。

2.2 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借鉴王家庭和赵亮^[1]的研究成果,选取城镇人口数和非农产业产值作为产出指标;选取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城镇就业人数、非城镇就业人口数(常住人口数-城镇就业人数)作为投入指标。

2003~2013年11年间^②,我国经济增速经历了由稳步

到高速再到回落的过程,近似形成1个经济周期;鉴于上述原因,本文选取2003~2013年31个省级行政区的数据对我国的城市化效率进行研究^③。另外,DEA模型中投入与产出指标之间需满足同向性要求,由于尚未确定投入产出指标是否符合正态分布,故采用非参数的“Kendall's tau_b”秩方法,借助SPSS19.0软件做相关性检验。根据相关性检验结果,投入产出指标满足同向性要求,可以使用DEA模型对决策单元进行效率评价。

2.3 效率评价

2.3.1 城市化效率综合评价

同一时期一定范围内的各决策单元处于同一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就会发生变化,导致生产前沿面的移动。DEA效率是相对于生产前沿面的指标;时间推移导致的生产前沿面移动使传统DEA-BC²模型计算出的不同时期DEA效率值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在求得历年城市化效率的基础上直接对31个省份求城市化效率年均值来综合反映它们在2003~2013年间的城市化效率是不可取的。本文借助Malmquist指数法来解决不同时期DEA效率值的可比性问题^④,通过该方法求得以2003年为基期的各省份2003~2013年的城市化效率并按年取均值,以综合反映11年间31个省份的城市化效率状况。使用DEAP2.1软件进行分析,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2003~2013年各省份城市化效率均值

省份	所在地区	TE均值	PTE均值	SE均值	省份	所在地区	TE均值	PTE均值	SE均值
1 北京-	东部	1.000	1.000	1.000	18 重庆↑	西南	0.916	0.922	0.993
2 上海-	东部	1.000	1.000	1.000	19 山西↑	中部	0.911	0.922	0.987
3 天津-	东部	1.000	1.000	1.000	20 江苏↓	东部	0.898	1.000	0.898
4 广东↓	东部	0.994	1.000	0.994	21 浙江↓	东部	0.896	0.975	0.917
5 贵州↑	西南	0.994	0.999	0.995	22 辽宁↓	东部	0.891	0.939	0.950
6 河北-	东部	0.993	0.993	1.000	23 福建↓	东部	0.883	0.891	0.991
7 湖南↓	中部	0.982	0.986	0.995	24 内蒙古↓	西北	0.870	0.874	0.993
8 黑龙江↑	中部	0.979	0.984	0.996	25 陕西↑	西北	0.863	0.870	0.992
9 安徽↓	中部	0.975	0.978	0.998	26 甘肃↑	西北	0.862	0.889	0.969
10 广西-	西南	0.975	0.978	0.998	27 云南↑	西南	0.835	0.845	0.989
11 山东↓	东部	0.961	0.990	0.970	28 宁夏↑	西北	0.829	0.970	0.854
12 湖北↓	中部	0.943	0.947	0.995	29 青海↑	西北	0.788	0.970	0.812
13 吉林↑	中部	0.938	0.944	0.993	30 新疆↑	西北	0.703	0.733	0.957
14 江西-	中部	0.938	0.943	0.994	31 西藏↑	西北	0.514	1.000	0.514
15 四川↓	西南	0.934	0.956	0.978	平均值	0.907	0.950	0.955	
16 河南↓	中部	0.922	0.945	0.974	标准差	0.101	0.060	0.094	

注:各有城市化效率均以2003年为基期;省份中↑、↓和-分别表示2013年该省份城市化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递减和不变状态;数字为各省份TE均值的排名;为了便于分析将西藏和内蒙古归入西北地区的相关省份

根据表1,可以发现2003~2013年我国各省份城市化效率排名具有一定的地区性特征^⑤。对各地区各省份的排名求

平均值来反映该地区整体排名,东部地区整体排名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南地区居第三,西北地区整体表现最差;前三

①由于该模型较常见,故各指标的含义予以省略

②这11年间也是我国城镇扩张最为快速的时期

③2011~2013年的城镇就业人数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其余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为保持统计口径一致,非农产业产值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以2003年为基期计算而得。

④出于逻辑结构考虑,Malmquist指数法的引入与Malmquist指数的计算结果见本文中“2.4城市化效率变动分析”,具体方法为:以2003年为基期,令该年各省份城市化效率(TE)乘以2003~2004年的EFFCH得到2004年的城市化效率,以此类推得到其他年份城市化效率;在计算PTE和SE时采取同样方法,均以2003年为基期,分别乘以历年的PECH和SECH。这样做一方面因基期一致而保证了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另一方面通过引入Malmquist指数而反映了历年效率的变动情况,在此基础上得到的历年效率具有可比性。

⑤按经济水平将31个省份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份;中部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份;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份。

个地区整体排名差异较小,但西北地区明显落后于西南地区。其中宁夏、青海和西藏的城市化效率主要制约因素在于规模效率的低下,结合2013年的规模报酬情况,说明这三个省份在提高管理水平的同时更应注重资源投入规模的增加。

从各省份城市化效率的过程中平均值来看,相对于规模因素而言,管理和技术水平不足对城市化效率的制约作用略大。从技术效率均值的标准差来看,省份间城市化效率存在较大差异,这不利于城市化的省际均衡发展;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值的标准差来看,城市化效率的差异

主要源于省份间规模效率的差异。从2013年的规模报酬情况来看,除了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状态的6个省份外,规模报酬递增与递减的省份数量基本持平,说明我国城市化过程中资源投入不足已经不是最主要的问题,需针对不同省份分别分析。

2.3.2 城市化效率地区差异的原因分析

由表1可知我国城市化效率排名存在一定地区性特征,本文通过对投入产出指标11年均值的对比分析来探索城市化过程中地区均衡发展的路径。

表2 2003~2013年城市化效率投入产出指标地区对比表

地区		城镇人口	非农产业产值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	城镇就业人口	非城镇就业人口
东部	总量	30052.92	145831.53	72270.89	11481.79	41709.95
	占全国比重(%)	48.19	59.66	49.76	52.00	38.09
中部	总量	18196.20	57819.61	39307.17	5814.07	36382.38
	占全国比重(%)	29.18	23.66	27.06	26.33	33.23
中部地区/东部地区		60.55	39.65	54.39	50.64	87.23
西南	总量	8959.09	24606.72	18702.84	2866.46	21029.46
	占全国比重(%)	14.37	10.07	12.88	12.98	19.21
西南地区/东部地区		29.81	16.87	25.88	24.97	50.42
西北	总量	5152.60	16162.12	14952.22	1917.55	10375.10
	占全国比重(%)	8.26	6.61	10.30	8.68	9.48
西北地区/东部地区		17.15	11.08	20.69	16.70	24.87

注:5个指标,中前两个指标为产出指标,后3个为投入指标;非城镇就业人口=常住人口数-城镇实业人口数

由于东部地区整体排名最高,因此以东部地区作为参照。根据表2,从产出指标各地区比重与东部地区比重的比值来看,城镇人口数比重高于非农产业产值比重,说明各地区与东部地区产出的差距主要表现在非农产业产值上。农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重会随经济发展而逐步降低,这是经济发展中的一般规律。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非农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例也最高,这是东部地区在城市化效率上占优的主要原因之一。中部、西南和西北省份的城镇人口数比重均大于非农产业产值比重,说明这些地区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口迁徙快于产业结构升级。这为非东部地区城市化效率的提升指明了方向,即在注重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迁徙的同时,更加注重非农产业产值的提高。

从投入指标各地区比重与东部地区比重的比值来看,非城镇就业人口数的相应比值均高于其他指标的相应比值,意味着各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常住人口中城镇就业人数比例过低,进一步说明了升级产业结构的重要性。升级产业结构以增加城镇就业人数和提高非农产业产值是提高非东部地区城市化效率的首要任务。

为了分析西北地区在城市化效率上落后于西南地区的原因,将西北地区各项指标占全国的比重除以西南地区相应指标的比重,得到以下比值:57.51%、65.68%、79.95%、66.90%和49.34%,分别对应:城镇人口数、非农产业产值、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城镇就业人数和非城镇就业人口数。从上述比值来看,在产出指标上城镇人口数的落后程度略

高于非农产业产值;从投入指标上看,西北地区在非城镇就业人口数方面有所节约,城市化效率低下的原因在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城镇就业人数两项投入指标的使用低效。因此,提高西北地区城市化效率的重点在于提升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城镇就业人数两项资源的使用效率。

2.4 城市化效率变动分析

如前所述,不同时期DEA效率值不具有可比性,故不能对不同时期决策单元经营效率变动情况直接进行纵向对比,Malmquist指数法^①的引入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该方法的优点之一在于能够考察时间变动导致的生产前沿面的变动情况,故而能够对决策单元进行纵向效率对比。

运用DEAP2.1软件计算2003~2013年全国各省城市化效率Malmquist指数,结果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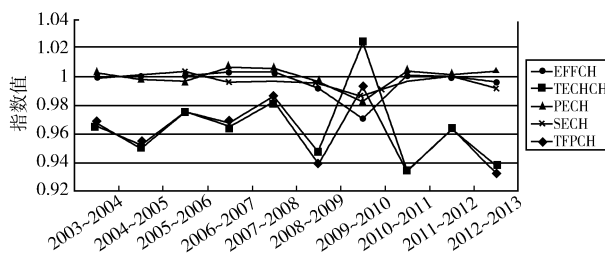


图1 2003~2013年全国平均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的走势

①Malmquist指数由Sten Malmquist于1953年首次提出,并被Caves等^[4]引入生产率测算领域,此后其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与DEA理论结合产生了DEA-Malmquist模型。Malmquist指数表示为:TFPCH=TECHCH×EFFCH, EFFCH=PECH×SECH。TFPCH为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指数,反映全要素生产率在相邻两年间的变动情况;TECHCH为技术进步变动指数,反映相邻两年间由决策单元外部制度和技术环境变化导致的生产前沿面变动情况,由于分析期间较短,技术环境变动不大,故本文的技术进步变动指数主要反映制度环境决定的生产前沿面变动情况;EFFCH为技术效率(城市化效率)变动指数,反映生产前沿面不变情况下,各决策单元内部因管理、技术以及规模因素变化而发生的城市化效率变动情况;PECH为纯技术效率变动指数,反映管理和技术因素变化对纯技术效率变动的影响;SECH为规模效率变动指数,反映规模因素变化对规模效率变动的影响。可见Malmquist指数法不仅能反映决策单元自身技术效率(城市化效率)的变动情况,还能反映外部技术进步情况即生产前沿面的变动情况,从而为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考察提供了路径。上述各个指数以1为分界点,大于1表示效率相对于上年上升,等于1表示不变,小于1表示降低。

根据图1,从TFPCH来看,2003~2013年全国的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持续降低状态。技术效率和生产前沿面均呈现整体下降态势。技术效率的下降意味着城市化进程中存在资源浪费和规模不合理的情况;生产前沿面的下降意味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所处的宏观制度环境不尽人意,各种制度如户籍、土地、就业、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不合理因素制约了城市化的发展^①。

2008~2011年各指数呈现大幅震荡,这与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与之后我国政府4万亿人民币经济刺激计划,以及其他制度改革措施有关。具体而言,2009~2010年的TECHCH大幅上升意味着制度大环境的优化,这主要与土地制度的改革有关^②。这为土地的集约化、高效化经营和城市化的发展夯实了制度基础,在满足城市化土地需求的同时,促使更多农民融入城市化大潮。2009~2011年EFFCH大幅震荡,主要与政府推出的4万亿经济拯救计划有关。技术效率大跌说明突然增加的大量固定资产投资导致城市化进程中本已存在的资源浪费和规模不合理问题进一步恶化,这种情况在2010~2011年间稍有改善。

另外,可以发现TFPCH的走势与TECHCH的走势相似。这说明影响我国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主要因素为生产前沿面的变动,意味着制约我国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为宏观制度中的不合理因素。由于分析样本不包含2003年之前的情况,因此可以认为样本期间内我国城市化已经度过了早期主要依赖资源投入的外延型阶段,已经处在内涵型阶段,主要问题在于如何为城市化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动力。

技术效率变动状况不容乐观。根据图1,EFFCH的走势由SECH和PECH共同决定,说明技术效率的变动受纯技术效率变动和规模效率变动的共同影响;结合全国11年的PECH均值和SECH均值(分别为1和0.997),意味着资源投入规模不合理是导致技术效率降低的主要原因。2008~2011年PECH和SECH的大幅波动带动EFFCH的大幅震荡,反映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实施中,政府的管理职能执行效果较差,资源投入规模不合理,导致城市化效率在2009年和2010年大幅降低,在2011年有所改善。

3 我国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在城市化效率评价的基础上,选取城市化效率(CSXL)、经济增长率(GDPZ)、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收入(DFCZ,反映地方政府的作用^[6])、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GYZB,第二产业增加值/GDP)、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FWZB,第三产业增加值/GDP)、固定资产投资增速^③(TZSS,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增速)、就业增速(JYZS,就业人数的增速)作为变量来分析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除CSXL和JYZS外,其余指标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JYZS来源于历年各省份统计年鉴。

本文构造如下联立方程:

$$CSXL_{it} = \alpha_0 + \alpha_1 GDPZ_{it} + \alpha_2 DFCZ_{it} + \alpha_3 GYZB_{it} + \alpha_4 FWZB_{it} + \alpha_5 TZSS_{it} + \alpha_6 JYZS_{it} + \alpha_7 CSXL_{it-1} + u_{it} \quad (1)$$

$$GDPZ_{it} = \beta_0 + \beta_1 CSXL_{it} + \beta_2 DFCZ_{it} + \beta_3 GYZB_{it} + \beta_4 FWZB_{it} + \beta_5 JYZS_{it} + \beta_6 GDPZ_{it-1} + \xi_{it} \quad (2)$$

上两式中,i和t分别代表省份和年份,t-1表示滞后一期, α_0 和 β_0 为两式的固定效应, u_{it} 和 ξ_{it} 为两式的随机误差项。两式依托2003~2013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因此可能存在伪回归问题,需做单位根检验以验证各面板序列的平稳性。本文同时使用LLC法和Fisher-ADF法对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8]。经过检验,上述各指标对应的原序列均为平稳序列,可进行联立方程模型分析。

根据两式的秩条件和阶条件,两式均为过度识别,并使用康继军等^[9]的方法检验发现两式存在联立性。鉴于三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较高的有效性^[10],本文使用该方法对两式中的系数进行估计^④,借助Eviews7.2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联立方程估计结果

变量	CSXL	GDPZ
常数项	0.216 *** (0.056)	0.055 *** (0.021)
GDPZ	0.032 (0.135)	
CSXL		0.027 * (0.015)
DFCZ	-0.003 *** (0.002)	0.001 (0.001)
GYZB	-0.090 * (0.050)	-0.041 *** (0.019)
FWZB	-0.144 * (0.080)	-0.063 *** (0.022)
TZSS	-0.186 * (0.099)	
JYZS	-0.129 (0.245)	0.093 (0.117)
CSXL(-1)	0.921 *** (0.035)	
GDPZ(-1)		0.675 *** (0.049)
R ²	0.896	0.464
Adj-R ²	0.893	0.453
D-W值	1.861	2.020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根据表3,DFCZ对CSXL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意味着地方政府财政措施越积极越不利于城市化效率的提高。在我国,政府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主体,中央政府制定政策,

①具体来说,在我国,政府和国有企业是基础设施的重要投资主体,同时享有土地和金融资源的优先分配权,对民间投资形成挤占,而公有经济的低效率制约了城市化效率的提高;现行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就业制度和和社会保障制度带有明显的城乡二元分割特征,形成了城市化发展的制度性障碍。

②2008年10月12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③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以2003年为基期求得。

④除选取上两式中各变量的一阶滞后变量为工具变量外,另选取城镇人口占比(城镇人口与常住人口之比)和在校本、专科大学生人数/常住人口的一阶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

地方政府负责政策的具体落实。地方政府财政措施积极程度越高,说明地方政府对城市化的干预作用越大。一方面,政府的作用主要通过地方投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来发挥,从而使公有制经济体效率低下的弊端向城市化领域蔓延;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过多干预对民间资本形成了排挤,限制了它们高效率运作能力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发挥。

GYZB和FWZB均对CSXL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说明总产值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的占比越高越不利于城市化效率的提升。当一个地区城市化刚起步的时候,第一产业是该地区的支柱,第一产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占比最高,此时城市化效率虽低但提高较快,即存在后发优势;随着城市化的推进,第一产业产值相对萎缩,第二、三产业产值占比逐渐提高,城市化水平逐步提高的同时效率的提升却会因后发优势的消失而受到抑制。总体来看,我国的城市化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产业结构升级即非农产业产值在总产值中占比的提升已经不利于城市化效率的提高。结合前面的分析,东部地区城市化效率虽高但非农产业产值占比的提升已经不利于效率的提高,说明东部地区城市化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由于东部地区在经济和人口总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而导致全国范围内呈现非农产业产值占比高不利于城市化效率的现象;而在中西部地区由于城市化发展较为落后,后发优势并未完全消失,仍应提高非农产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占比以提高城市化效率,这有利于缩小地区间城市化效率的差异。

TZZS对CSXL的作用显著为负向,意味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提高会带来资源的浪费。城市化的推进必然依靠资源的投入,但其效率的提高在于对现有资源的合理充分利用而非资源投入规模的扩大。结合我国现实,资源浪费始终是制约城市化效率提升的主要因素,做好现有资源的配置与使用是提高效率的首要任务。

GYZB和FWZB均对GDPZ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说明产业结构层次的提高不利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一个地区的经济在起步之初其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通过发展工业和服务业可以获得极高的经济增速;而当产业结构发展到一定程度,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值占比达到一定高度后,一方面经济总量的增大提高了经济增长的基数,另一方面后发优势的丧失尤其是第三产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弱^①,从而使经济增长速度显著放缓,这是经济增长中的一般规律。

重点关注CSXL与GDPZ的关系,两者间存在单向作用。后者对前者作用不显著,而城市化效率对经济增长速度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当城市化效率提高0.1时,经济增长速度会提高0.0027。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可以由多种因素引致,如自然资源的更多投入、人力资源的增加与素质提升、资源的合理配置与使用、制度的优化等,但归纳起来无非两点:资源的投入与资源的高效使用。城市化效率的提高意味着对现有资源更加高效地使用,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但现阶段我国城市化效率呈总体下降态势,故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经济增长对资源投入的依赖仍然很大,其速度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资源的更多投入,而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并不能直接带来资源使用效率的变化从而不能显著影响城市化效率。

4 结论与对策

2003~2013年,我国各省城市化效率排名呈现一定的地区性特征;城市化效率呈总体下降态势,主要原因在于资源投入规模不当;产业结构层次不高是制约非东部地区城市化效率的主要原因;西北地区城市化效率低下的原因在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城镇就业人数两项投入指标的使用低效;从全国整体来看,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持续降低的态势;全要素生产率降低的原因有两个:城市化效率的降低(资源浪费及规模不合理问题)、宏观制度环境中的不合理因素,后者为主要原因;我国城市化已处于内涵型阶段,其主要动力在于制度的优化;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及之后我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和制度改革措施导致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大幅震荡,土地制度改革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使资源浪费和规模不合理问题进一步恶化。地方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以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提高均不利于城市化效率的提升,中西部地区应提高非农产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重以提高城市化效率并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产业结构层次的提高不利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而城市化效率的提升却会显著促进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

在我国经济新常态和新型城市化大发展的背景下,应摆正市场、制度和政府三者的关系,强调市场的主导作用,注重制度的辅助作用,避免政府的过多干预。针对实证分析结果,我国政府应从职能转变和制度改革两个方面提升城市化效率和保持经济增长速度:首先,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弱化政府对经济和社会运行的干预作用,尤其在资源配置领域要使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其次,进一步深化制度改革。在城市化方面,逐步消除户籍、土地、就业、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不合理因素,以消除城乡制度差别为最终目标。具体来说,应通过开展土地确权工作,完善征地制度来进行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变事前迁移制为事后迁移制,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和解决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来进行户籍制度改革;通过完善农民工就业制度,优化农民工培训政策来进行就业制度改革;通过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一元化改革以及社会保障项目的扩容来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经济增长方面,一是进一步改革各种不合理的市场准入制度,打破各种行政垄断,大力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以提高企业层面的经营效率;二是进一步放开金融制度限制,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使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发展多层次金融体系,以繁荣金融市场,使金融资源得到更合理的配置以提高其使用效率;三是完善财税体制,强化预算约束机制,限制地方政府对经济过多干预,同时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减税扶持力度,发挥其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四是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保障力度,进而降低居民的储蓄倾向,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更为有力。最后,还应采取以下举措来提高城市化效率:有针对性地加大城市化资源投入规模;将升级产业结构作为提高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效率的首要任务;提高西北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城镇就业人口两项资源的使用效率。(下转第101页)

^①相对于第二产业而言,第三产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弱。例如,短期内通过大力建设基础设施,耗用大量钢铁水泥即可实现经济的较快增长,而短期内大力发展旅游业难以实现对经济的同等拉动。

4 研究结论与讨论

4.1 中国文化背景下“团队内关系格局”的多层次内涵更为合适

当前对关系的探讨大多从单一层面着手,仅从团队/组织层面考察整体关系特征,或仅关注个体层面差异关系感知,但在中国管理实践中单一层次的关系内涵无论在解释力还是在代表性上均具较大局限。因此对团队内关系的多层次探索,全面考察个体关系感知和整体关系特征,更贴近中国管理现实和文化特征。团队内关系格局是用以全面描述团队内关系的综合性构念,既包括个体层面的关系质量,又包括团队层面的关系差异。整合个体关系质量感知和整体关系差异比较的构念,方能深刻反映团队关系特征。

4.2 团队内关系格局是影响建言行为的重要因素,对不同建言方式产生截然不同的作用路径

团队成员交换关系和心理依附是影响建言行为的重要个体特征。团队成员交换关系促使建言,此时成员倾向于“说好话”的促进性建言,“说坏话”的抑制性建言行为不受欢迎;心理依附不同维度对建言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依附逃避就连“说好话”的建言都会减少,依附焦虑则会增加建言即便是“说坏话”。

团队成员交换关系差异和团队差序氛围是影响建言行为的重要团队情境。团队成员交换关系差异一方面通过团队差序氛围来间接对促进性建言产生跨层影响,一方面直接跨层负作用于抑制性建言;团队内关系质量对两种建言方式的作用机制还受到团队差序氛围的影响,团队差序氛围在其中发挥跨层调节作用。

4.3 团队内关系格局对行为方式的影响是通过心理认知来实现的,内隐建言信念是建言行为重要的内在动机与背后的驱动力量

内隐建言信念在团队成员交换关系与促进性建言之

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内隐建言信念在心理依附影响两种建言方式的过程中均发挥中介作用,只是对促进性建言的影响相对较大,然而内隐建言信念的不同维度呈现不同的中介效应。

内隐建言信念在团队内关系格局影响两种建言方式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不同维度在其中发挥的中介效应有所不同。其中对促进性建言的跨层中介作用中,团队内关系格局表现为心理依附与团队差序氛围的跨层交互效应;对抑制性建言的跨层中介作用中,团队内关系格局表现为团队关系质量与团队差序氛围的跨层交互效应。

参考文献:

[1] James R, Detert, et al. Implicit Voice Theories: Taken-for granted Rules of Self-censorship[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3): 461 - 488.

[2] Seers A, Petty, et al. Team-member Exchange under Team and Traditional Management; A Naturally Occurring Quasi-experiment[J]. Group &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1995 (20): 18 - 38.

[3] Brennan K A, et al. Self-report Measurement of Adult Attachment: An Integrative Overview[M]. In J. A. Simpson & W. S. Rholes(Eds.), Attachment Theory and Close Relationships. NY: Guilford Press, 1998. 46 - 76.

[4] Liao H, et al. Looking at both Sides of the Social Exchange Coin: A Social Cognitive Perspective on the Joint Effects of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Differentiation on Creativit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0(53): 1090 - 1109.

[5] 刘贞好. 差序气氛对部属工作态度与行为之影响[D]. 台湾东华大学, 2003.

[6] Liang J, et al. Promotive and Prohibitive Voice Behavior in Organizations: A Two-Wave Longitudinal Examination[C]. Biannual Meeting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2008.

(责任编辑:秦颖)

(上接第71页)

参考文献:

[1] 王家庭,赵亮. 我国区域城市化效率的动态评价[J]. 软科学, 2009(7): 92 - 98.

[2] 魏权龄. 数据包络分析[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1

[3] Banker R D, Charnes A, Cooper W W. Some Models for Estimating Technical and Scale Inefficiencies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J]. Management Science, 1984, 30(9): 1078 - 1092.

[4] Caves D W, Christensen L R, Diewert W E. The Economic Theory of Index Numbers and the Measurement of Input, Output, and Productivity[J].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1982, 50(6): 1393 - 1414.

[5] Färe R, Grosskopf S, Norris M, et al. Productivity Growth, Technical Progress, and Efficienc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 84(1): 66 - 83.

[6] 戴永安. 中国城市化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0(12): 103 - 117.

[7] 万庆,吴传清,曾菊新. 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2): 66 - 74.

[8] 李勇刚,高波,许春招. 晋升激励、土地财政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基于面板数据联立方程的估计[J]. 产业经济研究, 2013, (1): 100 - 110.

[9] 康继军,吴鹏,傅蕴英. 经济转型视角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研究[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1): 1 - 9.

[10] 吴一平,芮萌. 地区腐败、市场化与中国经济增长[J]. 管理世界, 2010(11): 10 - 27.

(责任编辑:李镜)